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专栏

高句丽、渤海文化发展的考古学观察^{*}

魏存成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汉唐期间，在我国东北地区先后由高句丽族和靺鞨族建立了两个政权，即高句丽政权和渤海政权。这两个民族及其政权为本地区历史与文化的进步、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高句丽族和靺鞨族皆属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作为高句丽、渤海两政权的主体民族，本民族原有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这是必然的；与此同时，高句丽、渤海文化的发展又接受了周邻民族和地区的多种影响。在这当中，高句丽、渤海两政权前后相隔30年，其疆域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在高句丽政权晚期，部分靺鞨人曾附属于高句丽政权，渤海政权建立后，又有部分高句丽人加入渤海，所以高句丽文化对渤海产生明显影响，也是必然的。而中原文化，经过长时期持续深入的全面发展已成为当时东亚文化的主导和中心，再加上高句丽、渤海与历届中原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则使中原文化在对高句丽、渤海产生影响的诸文化因素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高句丽、渤海文化正是在上述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过程中，才得以迅速丰富发展起来。

谈高句丽、渤海文化，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不同界定和含义，研究的视角和所依据的资料也会有区别和侧重，本文所谈的是以高句丽、渤海考古遗存中能够反映其文化面貌的资料为主，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对上述高句丽、渤海文化发展中的有关方面进行讨论。依照高句丽、渤海考古以往所做的工作和考古资料的通常分类，以下分别从以都城为代表的城址、墓葬和遗物几方面进行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085)；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



高句丽民族最早活动于辽东山地,此地“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高句丽人“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其人性凶急,喜寇钞”^[1];高句丽政权建立后,自始至终攻防战争又连年不断。因此,迄今发现的高句丽城址中,绝大部分属于山城。文献记,“高丽城雉依山”,一遇战事,“耕夫释耒,并皆入堡”^[2],就是指山城而言。所以不少学者认为高句丽名称的来源是与山城有关,并非没有道理^[3]。笔者曾对我国境内2009年以前公开发表的材料进行过统计,高句丽山城的数目达百座以上,另据介绍在朝鲜境内也发现了几十座。高句丽山城分布之广,数量之多,是其他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都无法比拟的,这是高句丽城址的突出特点。

高句丽对山城的无比依赖和重视,同样也影响到了它的王城。高句丽政权持续705年,从大的地区而言,其王城三治两迁,初都桓仁,公元3年一迁集安,公元427年再迁平壤。《周书·异域传》对迁都平壤后的王城有一段形象的描述:“其城,东西六里,南临湞水。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王则别为宅于其侧,不常居之。”这里说的“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指的就是山城,现学术界确定为大城山城;而“王则别为宅于其侧”,则是指位于大城山城附近的平原城清岩里土城或安鹤宫^[4]。这就构成了学界常说的山城与平原城相结合的高句丽王城特点。其实,高句丽王城的这种特点,在以桓仁为都的初期,(据近年发掘调查)五女山城与距其不远的下古城子古城平原城就具备了该特点所需的条件,而到以集安为都的中期,此特点就更为成熟完备了。丸都城和国内城,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相距仅几里之遥。丸都城几经修筑,规模巨大,设备齐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是在以集安为都的425年之中,高句丽王实际在此居住的时间并不多,绝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山下国内城中。而住在国内城期间,丸都城的地位和作用也并未减弱,二者配合呼应,相辅相成,构成了高句丽王城的整体有效防御。

高句丽王城的这种山城和平原城相结合的特点,到平壤地区的下一座王城长安城时则发生了改变。长安城始筑于公元552年,公元586年高句丽王移都于此。城址位于今平壤市区内,北面靠锦绣山最高峰,东、西、南三面由大同江和普通江围绕,周长23千米。城内据北高南低之地势,依次分隔为北城、内城、中城、外城,内城置王室,中城置衙署,外城置居民;其中在外城又规划、修建了整齐的内有十字街道的里坊。这种规划布局与同时期周邻地区的城址对照,则不难发现,它模仿了北魏洛阳城,或许还包括之前的大同北魏平城。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该城不能像北魏洛阳城那样规整,但王室、衙署和居民区各自为城,以及居民区内里坊的划分,与北魏洛阳城是很相似的。同时为了加强内城防御,在内城之北的山峰上又另修北城,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北魏洛阳城的金墉城。所以说,高句丽长安城是在原山城和平原城互相结合的传统基础上,又吸

收北魏洛阳城的规划之后形成的新布局。它既保留了原山城利于防御的优势，同时又改变了原山城和平原城分离两处的不便，将山城和平原城合为一体，使战时防御和平时居住达到了合理统一。据文献记载，在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前后的几十年中，高句丽朝魏使臣连年不断，有时一年之内多达几次。在这种频繁的交往之中，中原都城的制度和规划布局影响到高句丽，是不足为奇的。

渤海政权始建于公元698年，公元926年灭于辽。其王城三迁四治，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政权建立到“天宝中”之前以“旧国”为都的时期；第二个阶段自“天宝中”以中京为都开始，中经“天宝末”迁都上京、785年迁都东京，到794年迁回上京之前；第三个阶段自794年迁回上京开始，一直到926年灭于辽为止，每一个阶段都有着自己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时间不长，地点在今敦化，即文献所记渤海上京“直旧国三百里”^[5]的“旧国”所在。此处的王城城址，以往学界推断，一是城山子山城，即大祚荣“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6]的东牟山，今城内仍分布有众多的半地穴居住址，说明仍保留着靺鞨族“筑城穴居”^[7]的传统；与城山子山城相对应的有两处，一是敖东城，一是永胜遗址，但是据近年部分发掘调查，两处时代都晚于渤海，永胜遗址没有发现城墙。所以这里的考古工作仍有继续进行的必要。以往所说此处的渤海王城保留着高句丽王城山城与平原城相结合的特点，此种说法还需要验证。

第二个阶段的时间稍长，大概有50年的时间，并且涉及中京、上京和东京三个城址。

第三阶段时间最长，从公元794年到公元926年，计130多年，第二次以上京为都，一直到渤海灭亡再无变动。

经对比得知，西古城、八连城与上京宫城的形状、大小相似，尤其是西古城更为接近；城内宫殿方面，西古城、八连城的主要宫殿一、二殿相当于上京的三、四殿。由此说明上京第一次为都时的布局和规模大概也是如此。

渤海第二次以上京为都，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修。首先在整体布局方面，将第一次为都时的城址完全作为宫城，然后在宫城左、右、后三面修建了附属区，其中北面的附属区明显是参照了八连城的“北大城”，在宫城及其左右附属区前面修建了皇城，四面环抱宫城；同时，在它们的左、右、前三面修建了范围更大的郭城，郭城内由数条纵横交叉的街道划分为几十个里坊，以安排众多居民；在皇城和中轴大街的两侧还修筑了数座佛寺，在郭城的北面修建了远远大于宫城东侧附属区园林的“玄武湖”园林。所有这些，可明显看出是模仿了隋唐长安城的规划布局，而且从修建顺序来说，先修宫城，次修皇城，最后修郭城，也是与长安城同步的。

其次是在宫城内的建筑方面，在第一次为都时的内城南门处修建一座规模巨大的宫殿（即二殿），如同长安城大明宫的宣政殿，作为渤海王的“常朝之所”，属“中

朝”；同时在二殿之前又修建了一座大殿（即一殿），该殿和宫城的正门一起，如同大明宫的含元殿和正门丹凤门，作为渤海王的上朝正殿，属“外朝”；而原来的两座宫殿（即三殿和四殿），如同大明宫的紫宸殿，一起变成“内朝”寝殿了。北京大学宿白先生讲授隋唐考古时曾指出，大明宫的三殿制“是现知比较明确的最早的三殿制，此制一直延续到明清”^[8]。唐王朝刚刚创立的此项制度，很快就在渤海的上京都城中得以复制，可见当时中原文化对渤海影响之迅速。

二

高句丽、渤海墓葬发现众多，出土物也相当丰富。高句丽墓葬集中分布在三个王城地区，其中集安地区最为突出，据以往调查，集安市（县）境内的高句丽墓葬有万座以上。

高句丽墓葬的类型分为积石墓和封土墓两大类型。积石墓的名称来源于“积石为封”^[9]的文献记载。积石墓据其内、外结构的不同，又可分出几种不同的类型，而从时间先后之发展序列来看，则是积石石圪墓和积石石室墓。积石石圪墓流行于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前到5世纪，积石石室墓流行于3世纪末、4世纪初至5世纪。封土墓内部为石室，全称为封土石室墓，包括中小型无壁画封土石室墓和大中型有壁画封土石室墓（个别积石石室墓中也发现壁画）。中小型无壁画封土石室墓的时间上限，与积石石室墓出现的时间相当，其下限可到高句丽政权灭亡之后。大中型有壁画封土石室墓的流行时间在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

积石石圪是高句丽本民族的墓葬类型，之后发生演变，石圪变石室，积石变封土，与高句丽势力的发展和外部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高句丽自建立政权开始，就一直向外不断用兵，4世纪初占领了乐浪郡。乐浪郡是几百年以来中原政权在该地区的统治中心，汉文化影响很深，其中包括外覆封土，内为木椁、砖室和石室的墓葬制度与结构。正如《潜夫论·浮侈第十二》所记：“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时。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其后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櫬梓，豫章榱桷，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竞相用之。此之费工伤农，可为痛心。”^[10]可以想象，高句丽在接受中原文化其他因素的同时，墓葬内部构筑墓室的结构和外部覆以封土的习俗同样都会接收过来。与此同时，高句丽还不断西向辽河流域发展，5世纪初最后占据了中原政权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中心辽东。在以上过程中，陆续有大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被掠夺和流入高句丽，这就更加速了高句丽文化的发展和变化。高句丽墓葬的类型结构，石圪向石室、积石向封土的改变，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一共持续了4、5两个世纪。在这期间出现了一种过渡形式的墓葬，即积石石室墓，其数量不多，至5世纪末，便和积石石圪墓一起被日趋发展起来的封土石室墓取而代之了。

渤海墓葬的分布大体可划分为第二松花江中游、牡丹江上游敦化六顶山、牡丹江中下游、图们江流域、绥芬河流域与朝鲜半岛东北部几个地区。其时代，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的墓葬上自北朝，下至盛唐或盛唐之后，即渤海文王继位之后；敦化六顶山墓葬，上自渤海建立政权开始，下到8世纪下半叶；其余三个地区的墓葬开始的时间先后要晚一些，即迁都到中京或上京之后，下限都可到渤海政权灭亡之前。

渤海墓葬的类型分为土结构、石结构和砖结构三大类，土结构的是土坑墓，石结构的主要是石室墓，其他还有石圪和石棺（或石槨），砖结构的是砖室和砖槨，这些墓葬的地表不少还留有封土。

土坑墓在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是主流，在敦化六顶山墓葬中仍占有很大比重，而到牡丹江中下游地区和图们江流域则很少看到了，但是在绥芬河下游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还不断有发现。石圪墓在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开始出现，其石结构也很不完备，牡丹江和图们江流域仍有发现。在这当中，石圪墓有时与被破坏而失去盖顶石的石室墓和石棺（或石槨）墓容易混淆而不易区分，但是其数量不多，这一点还是明确的。石室墓的数量在渤海墓葬中发现最多，它出现于敦化六顶山墓群，自此开始，便成为渤海墓葬的主流。石棺（或石槨）墓与石室墓的分布地区相同，但数量不多。砖室墓则发现于上京附近和图们江流域，数量不多，以大中型为主，但也有小型的，留有室顶的则是以石铺盖。砖槨墓先后发现于河南屯古墓、龙海M13与M14，同在图们江流域的渤海中京附近，都属于高等级墓葬。

不同类型的渤海墓葬为什么会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出现和分布呢？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不同文化因素的来源和影响。根据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中俄两国多年的考古工作可知，土坑墓是靺鞨族的原有葬制。北朝末年，该地区的一部分人沿松花江南迁到第二松花江流域，与当地原夫余人融合形成粟末部，夫余的墓葬也是土坑墓，所以土坑墓继续流行。同时，此时由于与南边高句丽开始接壤，受到高句丽后期封土石室墓的影响，出现了少量的石圪墓。敦化六顶山墓群中的土坑墓多为中小型，其墓主人应是以留居本地区或周邻地区的以粟末部为主的靺鞨人，渤海政权建立，他们则聚居到敦化这里。而其余大量的以石室为主的石结构墓葬，其墓主人应是以自营州返回的靺鞨人和高句丽人为主。自营州返回的靺鞨人主要是原粟末部和白山部人，文献记载建立渤海政权的大氏家族就在其中，他们曾“附高丽”或“臣高丽”^[11]，接受高句丽的文化和葬制也会快些。渤海政权建立，这部分人是上层掌权者，所以六顶山墓群中比较大的墓葬多是一区的石室墓。之后，由于该文化因素的扩大，石室墓逐渐成为渤海墓葬的主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之所以还不断发现土坑墓，与此地北距黑水靺鞨不远、而受黑水靺鞨继续使用土坑墓的影响有关。

在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开始出现的石圪墓，属于从土坑墓向石室墓转变的过渡类型。说它是过渡类型，并不是说所有的石室墓都要经它转变而来，而是在过渡时期新出

现的一种与其他类型交叉并存的类型。

至于砖室和砖槨,不言而喻是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中,小墓尽管也有发现,但主要的还是在大中型墓中使用,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对渤海的影响是从上层统治者开始的。

简单归纳渤海墓葬的三种结构,时间早的土结构是靺鞨族原文化因素,其中也包含有夫余文化因素;石结构的是高句丽文化因素;时间较晚出现的砖结构是中原文化因素。这几种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渤海墓葬的不同类型。但是,它们之间又不是截然分开的,相互之间也有交叉和融合。比如砖室墓和砖槨墓以石板盖顶,则是采取了石室墓的做法;而数座大型渤海王室贵族墓葬,不管是砖室、砖槨,还是石室,都是修于地下,有的还比较深,为出入方便,设墓道的则修成斜坡式或斜坡阶梯式,这显然又是接受了中原墓葬的做法。

墓葬壁画也是墓葬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高句丽的壁画墓发现很多,迄今在我国和朝鲜境内发现的壁画墓共计百座以上,其时代从4世纪中叶到7世纪初。壁画的内容,先是仿中原汉代墓葬壁画以家内、出行等生活场面为主,接着转变为以莲花、拜佛等佛教题材为主,显然这与文献所记中原佛教的传入有直接联系,最后则是以四神图像为主,而且还可看到道教的色彩。壁画中人物的服饰多表现为文献所记高句丽本民族的特征,而中原的影响也随时可见^[12]。

渤海的壁画墓发现不多,保存比较完整的是贞孝公主墓的壁画。该壁画分绘于墓室左、右、后三壁和甬道两侧,内容为十个侍者和两个卫士。侍者粉面朱唇,体态丰腴匀称,头戴幘头或裹抹额,身穿圆领长袍,腰间束带,手捧各种包裹器物,其服饰、姿态及绘画风格与两京唐墓壁画无异。

三

在以上高句丽、渤海的王城、墓葬和其他山城、遗址中,通过多年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建筑构件、陶器、金属器等遗物,从中同样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因素和影响。

建筑构件中发现比较多的是各种瓦件和础石。文献记高句丽具有“好治宫室”的传统^[13],但是由于其地理环境“多大山深谷”,所以一直到唐代仍是“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其俗贫窶者多,冬月皆作长坑,下燃温火以取暖”^[14],说明能够使用瓦件和础石的都是高等级的建筑。发现瓦件的墓葬也主要是大型积石墓王陵。瓦件中常见的是板瓦、筒瓦和瓦当,在墓葬上发现的瓦件皆是灰色,而在城址、建筑址上发现的瓦件绝大部分是红色,看来这是有意安排的。板瓦下沿,有的饰以按压纹;板瓦、筒瓦凸面的纹饰,时间早的为粗细不等的绳纹,之后则是斜方格纹、方格纹、席纹和素面等。其中本地区特征比较明显的是斜方格

纹、方格纹和席纹，而其他纹饰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没有区别。瓦当的纹饰，墓葬瓦当中先后出现的是云纹和莲花纹，建筑址瓦当先后出现的是云纹和莲花纹、忍冬纹、兽面纹。其中云纹瓦当是中原地区汉代以来流行的瓦当，莲花纹、忍冬纹、兽面纹饰也是中原地区佛教流行后在瓦当或花纹砖中常见的纹饰，不过高句丽的这几种纹饰具有自己的特征。高句丽的础石，一种是与中原地区相同的覆盆式，另一种是在其他地区不见的八角形。

渤海瓦件中的板瓦和筒瓦，六顶山墓地出土的还见绳纹、斜方格纹和方格纹，之后则是素面广泛流行了。板瓦下沿的按压纹在渤海继续使用，而新出现的栉齿联圈纹则只见于渤海；筒瓦唇部做出的两道突楞，也很少见于其他地区。瓦当花纹，六顶山墓地发现的是乳丁纹和十字纹，其中与乳丁纹瓦当中部分花纹相似的瓦当在集安高句丽东台子建筑址和琿春渤海温特赫部城发现过^[15]，之后大量流行的则是形式多样的莲花纹。莲花纹中可以看出高句丽和中原地区莲花瓦当的影响，同时自身的特征又很突出。渤海础石仍做成覆盆形状，但是在覆盆的外面再套以陶制的覆盆圈，又是渤海独特做法。渤海瓦件、覆盆圈和屋顶的鸱尾、套兽等构件，有的还饰以明亮的单色绿釉或多色釉，该装饰及其工艺当然是来自中原。

陶器在高句丽、渤海器物中是最常见的，而且器类和器形也是最复杂的。据研究，高句丽陶器中含有本地区原土著文化陶器、辽东与乐浪汉文化陶器、辽西鲜卑陶器、中原北魏陶器的几种因素^[16]。其中关于本地区原土著文化陶器，是指辽东地区和第二松花江流域战国至汉初早期铁器时代，以及此前青铜时代的数种文化的陶器，它们对高句丽陶器的影响如何，近年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和探讨，希望能继续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比如高句丽陶器上流行的竖耳和横耳，就可能是源自本地区土著文化的陶器。

渤海陶器中含有原靺鞨陶器、夫余陶器、高句丽陶器、中原陶器的几种文化因素，其典型器物是原靺鞨陶器中的深腹筒形罐，又称靺鞨罐，它贯穿了渤海政权的始终。靺鞨族南迁到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后，鼓腹罐开始在靺鞨、渤海墓葬中流行开来，应该是受到南邻高句丽陶器和当地原夫余陶器影响的结果。高句丽、渤海陶器中都有低温釉陶器物，高句丽釉陶是4世纪初高句丽占领乐浪之后、受乐浪釉陶影响发展起来的，而渤海釉陶是受唐三彩影响发展起来的。上述单色绿釉和多色釉建筑构件发现数量多，不会是从其他地区运来，而是在渤海烧造的，说明渤海已经掌握了三彩工艺，因而渤海也就完全可以烧造其他三彩器（包括容器器皿和随葬俑），当然也不排除在此过程中有中原产品输入。渤海还发现了碗、枕等绞胎器物，这无疑是中原输入品，近年河南省黄冶唐三彩窑址发掘就出土了与此造型、花纹相同的绞胎枕^[17]。

出土发现的高句丽金属器比渤海要丰富，比较突出的是镞、矛、刀之类的兵器和狩猎工具，其他还有马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多为铁质，也有铜质和鎏

金的等。这些器物绝大部分是高句丽自己制造的,但与其他地区出土的样式基本一样,有的生活用具和装饰品还可看出是中原地区制造的。由于高句丽民族一向便鞍马、善骑射,所以不仅镞的发现数量大,形式多样,而且发现的数套马具也相当精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马具发展完备的重要时期,经比较得知,高句丽马具的发展受到西邻鲜卑马具的影响,同时它又影响到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

渤海发现的金属器种类与高句丽的相同,其中镞的数量仍比较多,而马具则不再突出,常见的是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其中带具比较突出,有的是中原制造的。渤海和高句丽一样,自己不制造铜镜,各自发现的少量铜镜,都是当时由中原输入的。

高句丽、渤海都发现了重要的碑刻墓志。高句丽原发现的是好太王碑和中原郡碑,2012年在集安麻线又发现了一通。渤海发现的是贞惠和贞孝两位公主的墓志。这些碑刻墓志用的全是汉字,高句丽碑刻中还有与汉语规范不同的个别字句,而在渤海墓志中则看不到这些迹象了。

四

以上是从考古遗存发现简要考察了高句丽、渤海文化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其中在考察高句丽、渤海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时,只介绍了中原地区对高句丽、渤海的影响,其实高句丽、渤海文化对中原地区同样是有影响的。文献记载,高句丽的歌舞传入中原,成为隋唐王朝宫廷歌舞的组成之一,大诗人李白还为此写下了生动形象的诗篇^[18]。渤海曾献“金银铜佛”和“紫瓷盆”给唐王朝^[19],渤海王子和学子入唐学习政治、文化,参加科举考试,才有温庭筠在送别渤海王子时所留下的“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的真实写照。通过此双向的频繁交往,高句丽、渤海文化和中原文化融为一体,丰富和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高句丽后来发展到朝鲜半岛北半部,与半岛南部和日本开展了各种交往,渤海更是利用其发达的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开通了日本道,同时还开通了新罗道,于是他们在加强本地区文化和中原文化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流中,都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注 释

[1] 三国志[M].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高句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843.

[2] 册府元龟[M].卷九八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11571.

[3] 魏存成.高句丽的兴起及其与玄菟郡的关系[J].东北史地,2009(6).

[4] 关于与大城山城相结合的平原城,是清岩里土城还是安鹤宫,现在学界看法不一,据有关学者对两城址出土瓦件时代特征等迹象的分析,是清岩里土城的可能性要大些.

[5] 新唐书[M].卷二百一十九北狄·渤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6:6181.

- [6] 旧唐书 [M]. 卷一百九十九北狄·渤海靺鞨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360.
- [7] 魏书 [M]. 卷一百勿吉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220.
- [8] 宿白. 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 (下)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111.
- [9] 三国志 [M]. 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高句丽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844.
- [10] 诸子集成 (第八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56、57.
- [11] 关于靺鞨粟末部和白山部的位置及其与高句丽的关系, 隋书·靺鞨传 [M] 曰: “靺鞨, 在高丽之北, ……凡有七种: 其一号粟末部, 与高丽相接, 胜兵数千, 多骁武, 每寇高丽中……其七曰白山部, 在粟末东南.”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 [M] 曰: “黑水靺鞨居肃慎地, 亦曰挹娄, 元魏时曰勿吉……离为数十部, 酋各自治. 其著者曰粟末部, 居最南, 抵太白山, 亦曰徒太山, 与高丽接, 依粟末水以居……粟末之东曰白山部. 部间远者三四百里, 近二百里. 白山本臣高丽, 王师取平壤, 其众多入唐.”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 [M] 记: “渤海靺鞨大祚荣者, 本高丽别种也. 高丽既灭, 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 万岁通天年, 契丹李尽忠反叛, 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 保阻以自固……祚荣骁勇善用兵, 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 稍稍归之.” 新唐书·渤海传 [M] 记: “渤海, 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 姓大氏. 高丽灭, 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 地直营州东二千里, 南比新罗, 以泥河为境, 东穷海, 西契丹. 筑城郭以居, 高丽通残稍归之.” 大祚荣的族属, 旧唐书言“本高丽别种也”, 其意不确, “别种”也有不同之理解; 而新唐书改为“渤海, 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 姓大氏”, 说明了渤海大氏的确切族源不仅是靺鞨, 而且是粟末部, 同时也说明了它曾与高句丽的关系, 应以《新唐书》为准.
- [12] 参见郑春颖. 壁画所见高句丽服饰研究 [D]. 长春: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 [13] 三国志 [M]. 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高句丽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843.
- [14] 旧唐书 [M]. 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高丽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320. 此“长坑”, 乃下设烟道的取暖设施, 即后来的火炕. 高句丽、渤海都流行此取暖设施, 在属于汉代沃沮遗存的黑龙江省东宁团结遗址居住址中也普遍存在, 可见这是东北地区古代民族共有的防寒设施.
- [15] a.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集安县文物志 [M]. 长春: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1984: 258, 图版贰拾捌.
b. 魏存成. 渤海考古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152、153.
- [16] 参见孙颖. 高句丽陶器研究 [D]. 长春: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 [17] 河南省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黄冶唐三彩窑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18] 李白: “金花折风帽, 白马小迟回, 翩翩舞广袖, 似鸟海东来.” 参见全唐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389.
- [19] 所献“金银铜佛”和“紫瓷盆”分别载册府元龟 [M] 和杜阳杂编 [M]. 转引自渤海国志长编 [M] 卷一·总略上, 见王承礼, 张中树点校. 渤海国志三种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196、245. 迄今没有发现渤海自己烧造瓷器, 此处所记的“紫瓷盆”应是釉陶制品. 另, 高句丽自己也不烧造瓷器, 集安禹山3319号墓出土几件青瓷盘口壶, 乃江南输入品.

The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s in Koguryo and Bohai State

Wei Cuncheng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s in Koguryo and Bohai State was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 of the site, tombs and relics,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se cultures not only inherited the original culture of the ethnic majority, but also absorbed the influence from neighbor nationalities and regions. During that time, because Koguryo regime and Bohai State had the close time of the rise and fall and had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which determined that Koguryo culture had obvious influence on Bohai culture; but due to the inherent advantages and status,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lways occupie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mong various cultural factors which impacted on Koguryo and Bohai State.